

# 邮海泛舟记趣

谢其章

这个题目原本是二十年前拟的一个书名，小题目也拟了三十来个。如今我已无力写一本书的容量，但是心中挥之不去的集邮往事，足够写成一两篇几千字的短文。

集邮的门槛很低，人人皆可集邮，不分年龄，不分贫富。我是念小学时喜欢上集邮的，家里从来没给过我零花钱，姐姐是老大，零花钱归她掌控。我那寒酸的几十张邮票多是邻居大哥送的盖过戳的旧票，我视若珍宝似的粘在本子上。正巧翻出一个三十几年前的事记小本子，有一条用在这里很合适，可佐证我的集邮初旅。“一九八六年三月开始集邮，其实小时候也集过，有两小本，小群画的封面，后来在公众号时送给老曹了。为了集邮，在三门峡小书亭买了《邮票百科全书》和《世界简明邮票手册》，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中国邮票目录》，方寸之地，还有不少掌故呢”。

为集邮而去邮局买新邮票则是我三十岁以后的事情了。我上班的单位的旁边就是邮局，现在贵如金子的猴票（1980年2月发行）当时波澜不惊，一飞冲天那是很多年以后的景观了。集邮的三大好处“增识、怡情、储财”，“八〇猴”在储财增值上的表现堪称经典。1986年我用32元买的猴票四方联，合8元一枚，较之原面值八分钱增值一百倍。2007年我在邮票市场12000元卖掉了猴票四方联（当时朋友劝我别卖，称还得升值呢，果然被他说中了），虽然不是我第一回出售邮票，但是“八〇猴”的意义非同寻常，意味着我羞涩的集邮史近乎结束了。

上面说的“一九八六年三月开始集邮”，起因是当时有份彩印的报纸《生活参报》，在京城非常畅销，其中收藏版上有个栏目“邮市沉浮录”，文风像邮票贩子的口吻且夹杂着不逊于集邮家的经验之谈。有一回题目叫“灯下不看票”，说是光线不好的时候不宜进行邮票交易，如果回到家再发现邮票有瑕疵，一般而言是不退不换的。可以这么说吧，我就是被这句“灯下不看票”深深打动从而进入集邮之门，并且马上去西单商场买了集邮册，同时订阅《集邮》杂志及购买邮票目录，把自己武装起来，准备真刀真枪地上阵。

怎样才能迅速把集邮册填满呢？几十年后的回忆总是模糊的，唯有这本貌不惊人的小书《集邮爷爷信箱》（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8月北京第一版）忠实地还原了差点遗忘的细节。扉页上有我1992年3月18日晚上写的一段话，“这本书好像是一九八六年购于石驷马大街书亭，当年我就是凭着它把新JT票一套一套买齐的，其间甘苦自知。”《集邮爷爷信箱》里讲解了什么是什么是JT票：“1974年以后的纪念邮票改用‘J’字开头（‘J’是‘纪’字的拼音字头），特种邮票改用‘T’字开头（‘T’是‘特’字的拼音字头）”。1974年之前的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俗称“老纪特”，对应之后的“新JT”，这是邮票市场上的叫法，通俗易懂。我是新手，那就随大溜吧，从JT票攒起吧。

老纪特、新JT之外的“普票”“文字票”“编号票”等，由于玩的人少，不是追捧的热门，前面讲的“八〇猴”在新JT的

序号为“T46”。我认识的几位邮友，其中一位是邻居住我楼下（我常常去他家买邮票），这几位文化程度不高，却能倒背如流地说出几几几对应的邮票名称，而且颇具化繁为简的能力。比如T16票名“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他们简称“珠峰”；T95“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简称“葛洲坝”。J票票名普遍比T票长得多，最长的达三十来个字，如J13和J61，看似简无可简，邮友也能找出关键词来删繁就简，这种本领也许是谋生的手段，也许只是“卖油翁”的手熟而已。

当年的邮局只出售新发行的邮票，那么想搜集不是新发行的邮票去哪儿买呢？甬发愁，集邮爱好者自发地聚集在邮局周边的空地，三五成群，周日多达上百人，一个个邮票交易市场便形成了，邮票娇贵，靠天吃饭，风霜雨雪不宜交易。我的JT票绝大多数是在南礼士路邮局大院的邮市里配齐的。每逢休息日便带着《集邮爷爷信箱》去逛，这本小册子后面附有《新中国邮票目录》，可以“按图索骥”，我的方法是买到一种就在目录上画个勾，去一趟有时能画两三个勾，越是接近配齐，勾画得越多。这本小册子记载的J票到J111，T票到T105，两者相加不过二百出头，我用了大约十几个休息日就搞定了。那时候女儿四岁，我带她去逛集邮小市场，不久妻子对我讲，女儿说我爸怎么老给人家钱呀？想想是挺可笑的，这人手一买一套票，那人手里一套票，掏钱动作连续做十几回，女儿当然也奇怪。怪不得有人说收藏癖者是自私的，为了自己的爱好，让女儿跟着我混迹于

邮市，如今忆及，仍感内疚。

为了便于管理邮票交易，月坛公园内开辟了较为正规的邮票交易市场，门票一元，有市场管理员，有固定的棚屋式摊位，也有先来先占的地摊，再有就是穿梭于人群中的流动性邮友（这种人要多加提防，不与之作交易）。集邮热最火爆的那几年，邮市内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甚至寸步难行。我再也没有带女儿逛过，尽管月坛邮市离我家比之南礼士路邮局近一半的路。

我成了月坛邮市的常客，月坛邮市让我大开眼界，大增见识。西洋集邮界有句名言：“予我以邮票，不如告我以邮识。”我们也有类似的名言：“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正规的邮市里藏龙卧虎，高明的邮商很多，经营特色也是散市没法比的，珍稀邮票这里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简直是民间邮票博物馆。我也从初级的只集JT票转向专题集邮，稍稍拉开与“大众集邮”的距离，搜集难度随之增加了不少，乐趣与难度成正比，唾手可得即没啥乐趣可言。

我选定“文字厂铭”这个小专题。“文字厂铭”是厂铭的一种，印刷邮票的工厂把厂子的名称印在整版邮票的边纸上，这就是文字厂铭。整版邮票只有一个厂铭，再多也不过四个，你购藏的带有边纸的邮票很少碰到厂铭，原因即在此。物稀为贵，带厂铭的价钱要贵出许多。

我粗略统计过，北京邮票厂建成之前，新中国邮票的文字厂铭多达十几种，涉及上百种邮票。它们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上海市印刷一厂、北京人民印刷厂、华东税务局印刷厂、三一印刷

公司印刷、大东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北京中国人民印刷厂、光华印书馆、中央信託局印刷厂、中华书局永宁印刷厂、上海人民印刷厂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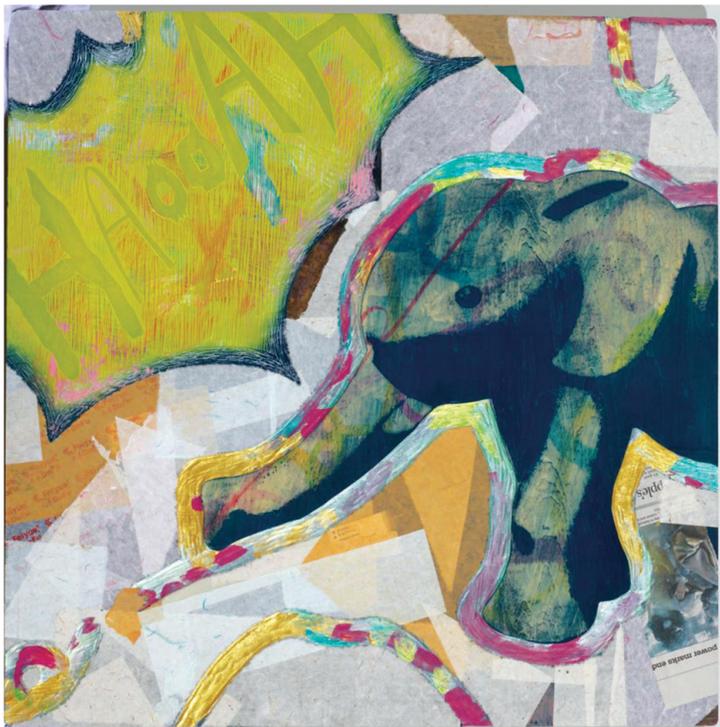
文字厂铭有时正好印得横跨两枚邮票，这样的厂铭有个美丽的名字——“骑缝厂铭”，我对骑缝的厂铭格外偏爱，有时候即便买重了，亦在所不惜。早期的新中国邮票骑缝厂铭较多，我是见一收一，见二收二，上瘾。骑缝厂铭常常被卖主撕开了卖，弄得“身首异处”，糟蹋了好东西，令人好不怜惜。如“上海市印刷一厂印制”，一撕，变成这张票的厂铭是“上海市印”，那张票是“一厂印制”，中间的“刷”字被分了家。纪17《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邮票，四枚一套，第2、3、4枚是骑缝厂铭，第1枚不是，集票时应该注意。

厂铭在一套枚数较多的邮票中，是不大容易凑齐的，好不容易凑齐了，厂铭的位置不对称还是一件烦心的事。特13《努力完成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是18枚一套的大套票，著名邮票设计家孙传哲设计，是“上海市印刷一厂”的骑缝厂铭，极难一求，邮海泛舟二十余载，只见到一次，良机焉可错过，此时我的淘票功夫早已修炼到家，当然不会有任何的迟疑。

2000年冬为了凑钱在旧书店买旧杂志，我卖掉了所有JT票，但是厂铭票一套也没卖。JT票可以不费力地补回来，而厂铭票几乎没有“失而复得”的机缘。

搜集集邮书刊也是我一个专题，比较得意的收获有全份125期老《集邮》杂志（1955年1月至1966年6月）；1940年代《国粹月刊》《邮友月刊》《近代邮刊》《邮典》杂志等。集邮图书有《保值珍邮》《中国珍邮》、姜治方《集邮六十年》，黄光城《红印花小壹圆票存世考图鉴》，哲夫《邮海漫话》等。哲夫是郑介初笔名，一九四五年郑介初还是重庆念书的中学生，无意之中竟然以面值买到五十枚整版“纽约版贰圆中国倒印”邮票，自此传奇的集邮经历伴了他的一生。

三十年泛舟邮海，如今息帆泊岸，思绪很有点儿李商隐《赠柳》“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的意味。



## 笔会

象声词

(2019)

铃木隆太

选自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版·丝路——2024上海国际版画展”

## 漳州的调性

罗小茗

坐在漳州古城的茶馆店里，老板一边泡茶，一边抱怨：过年的时候，古城里挤满了人，吵死了——“我不喜欢！”

此刻，外头是乍暖还寒的春日黄昏，古城的街上统共没有几个人。路边的店家开得稀稀拉拉，店主们多是闲坐，就着路边的小茶几，有一搭没一搭地喝茶。对于那寥寥几个东看西看、探头探脑，脑门上写着“游客”两字的人，丝毫没有搭讪和推销的意思。更多的店面，虽写明了午后两点开门，此时却依旧铁将军把门，让整个古城更显清冷。

就这样，一路走过古城里各种“文不对题”的商店。这些沿街的二层楼房，大多保留了百年前的店招，用不同的字体写着某某医馆或洋行杂货的大字，辅之以华丽而繁复的石雕，尽显当年经营者的气派。可店招下的铺子里，卖的却是满坑满谷的香烛、竹编、糕饼或家用百货，和头上的名号，竟没有半点关系。用来居住的二楼，看起来也有些破败，大多闲置。一时间，竟把我这样的游客惹得疑惑起来。原本是刻意避开旅游的高峰，据说今年春节有近334万人涌入漳州，逛古城、看游神。可这才过去没几天，顶流时刻的热闹与喧嚣就彻底消退，不仅冷清，就连景点里从不缺席的千篇一律的特色商品，也很少见到。这反倒让做惯了游客的我有点不适应了。

疑疑惑惑中走进上面这家茶馆，想借着歇脚的工夫，看看小楼的内样式。茶馆显然是花了心思翻新过的，房顶上铺了一层福建特色的茅草，原有的房梁结构被保留下来，还特别挖了一个小水池，几尾锦鲤游弋其中。可此时的店里，同样一个客人都没有，只有老板一人，稳坐钓鱼台。于是，忍不住提出对古城的疑问：“这里平时就是这样的吗？看上去有些荒凉呢。”不料这个问题，引出的却是开头那一通老板的抱怨。这种对游客的“不待见”，和摆开八仙桌招揽四方客的老板的身份很不匹配，让人颇有些意外。身在旅游景区，租了房子做生意，难道不应该希望整日里人流涌动、顾客盈门才对吗？那些将自己定位为“网红”的城市，又有哪一家不是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住大家的眼球？老板却淡淡地说：“我们不靠这个。我做的是本地的生意！”

好玩的，是古城里有如此主张的，并非老板一人。另一家剪纸铺的主人，那口气那神情，几乎一模一样。看到有人欣赏店里装裱好的剪纸作品，他张嘴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店的东东西多不卖的。”在接下来半个多小时里，小伙子仔仔细细介绍了每一幅剪纸背后的故事。每讲完一幅，他都要认真地补上一句：我是被这个故事打动了，才想把它剪出来，要把这份心情传递出去。故事固然不错，可习惯了“游客”心态、动不动就要为旅游景点商家的收支平衡担忧的我们，却对这间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剪纸作品却不屑于卖货的小店面，充满了疑惑：这家伙到底是怎么维持生计的呢？我们靠上节目，做项目啊……”看起来，和茶馆店的老板一样，小伙子既不为自己的生计忧愁，对游客也没有什么期盼之心。他最感兴趣讲

的，是自己的创作意图。

接下来的几天便发现，如此姜太公一般的自得，不光是古城里一两个略显特别的店家，而是在角角落落都能感受得到。闽南的狮子则多喜庆之色。可若仔细观察漳州城里那些大小不一、年代各异的石狮，便会发现：同样是满面喜气的石狮，移步到漳州界面上时，便多了一份又憨又困、哭笑不得的神情。它们不仅对身为石狮这件事情不感到自豪和自傲，反而有点“这辈子居然转世成了狮子啊”的茫然失措，但又有一丝转念之后的毫不介怀——“既然如此，那就这样了吧”。这份颇感意外却也坦然处之的喜悦，自是使得它们和那些喜庆却依旧踌躇满志的石狮们，很是不同（图为漳州的宋代石狮）。

不过，最能表现这种任性自得的调性的，当属东山的一项技艺——剪瓷。按照博物馆里的介绍文字，剪瓷是选取色彩鲜艳的彩瓷器，或利用残存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按需要剪成细小的瓷片来贴塑人物、动物、花卉、山水等，用以装饰建筑物。因此，远看是色彩夺目的庙宇宫殿、雕梁画栋，细看之下，却是由一片片碎瓷拼凑捣鼓而成。不知道历史上到底是哪一个聪明人最先想到了此种废物利用的好方法，让业已破碎、不再可用的瓷片摇身一变，成为生动夺目的艺术品。这样的脑洞，若少了任性自得的调性，恐怕也很难开启吧。更令人惊异的是，由此做出来的东西——楼台也好，人物也罢，就其声势而言，颇有些喧宾夺主的意思，竟一点也不介意那只是残次品的过往和作为装饰的配角身份。于是，原本不过是用来装饰屋脊、

来招待你，便算是营业了。又因为收的茶钱极便宜，坐在那里，与其说是喝茶休息，不如说是就着店里那家长里短的好气氛，顺便喝了一顿茶。

来招待你，便算是营业了。又因为收的茶钱极便宜，坐在那里，与其说是喝茶休息，不如说是就着店里那家长里短的好气氛，顺便喝了一顿茶。

这种任性自得的调性，渗透在漳州这座城市之中，就连石狮们也毫不例外地浸染上了。虽说石狮的雕刻技艺从来就有南北之分，北方的石狮以威严孔武著称，闽南的狮子则多喜庆之色。可若仔细观察漳州城里那些大小不一、年代各异的石狮，便会发现：同样是满面喜气的石狮，移步到漳州界面上时，便多了一份又憨又困、哭笑不得的神情。它们不仅对身为石狮这件事情不感到自豪和自傲，反而有点“这辈子居然转世成了狮子啊”的茫然失措，但又有一丝转念之后的毫不介怀——“既然如此，那就这样了吧”。这份颇感意外却也坦然处之的喜悦，自是使得它们和那些喜庆却依旧踌躇满志的石狮们，很是不同（图为漳州的宋代石狮）。

不过，最能表现这种任性自得的调性的，当属东山的一项技艺——剪瓷。按照博物馆里的介绍文字，剪瓷是选取色彩鲜艳的彩瓷器，或利用残存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按需要剪成细小的瓷片来贴塑人物、动物、花卉、山水等，用以装饰建筑物。因此，远看是色彩夺目的庙宇宫殿、雕梁画栋，细看之下，却是由一片片碎瓷拼凑捣鼓而成。不知道历史上到底是哪一个聪明人最先想到了此种废物利用的好方法，让业已破碎、不再可用的瓷片摇身一变，成为生动夺目的艺术品。这样的脑洞，若少了任性自得的调性，恐怕也很难开启吧。更令人惊异的是，由此做出来的东西——楼台也好，人物也罢，就其声势而言，颇有些喧宾夺主的意思，竟一点也不介意那只是残次品的过往和作为装饰的配角身份。于是，原本不过是用来装饰屋脊、

我拜读完孙郁大作《闲话汪曾祺》（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想写点东西，却四顾茫然，无从下手，于是翻出典藏《百年曾祺：1920-2020》（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2月）找灵感，不知不觉翻到林斤澜的《纪年终年》——

有天，未电话说，当天《北京日报》副刊上有篇好文章，作者不见经传。我说我家没有《北京日报》，他说他寄给我，又说太慢，有点着急的样子。我接下接到报摊上买一张。接着我转了两个报摊，都没有“进”这个报。只好打电话给我女儿，从办公室借一张回来。第二天，他又约了邵燕祥三人各写一篇短评一起发表。

如果林斤澜简单交代下时间、作者或标题，顺藤摸瓜或许能写出篇挺有意思的文章。我特意在这段文字旁批注“谁？”心想哪天找到“线索”再去拷问这两期副刊电子版，打印出来仔细端详，好好咀嚼咀嚼汪曾祺的散文观：“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我继续翻典藏《汪曾祺自选集》（商务印书馆2020年6月）、《汪曾祺自述》（大众出版社2017年9月）、汪曾祺《后十年集·散文随笔卷》《后十年集·小说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9月），无意中从“散文随笔卷”发现“新大陆”——《花溅泪》。1997年3月7日，汪曾祺从《北京日报》副刊《生活》读到业余作者车军900字的短文，颇为感动，主动写下500短评，导语开门见山：“我很少看报纸而流泪，但读了《爱是一束花》，我的眼睛湿了。”

这是汪曾祺去世前两个月留下的文字。他从这篇令他“眼睛湿了”的文章中，影影绰绰看到一个42岁的中年妇女的影子，一个平常、善良而美丽的灵魂。她忍让宽容地对生活，从不抱怨，从不倾诉。但是多么让人不平啊：早些年家里不富裕，摆不出做女孩子的娇羞；工作了，搞建筑，扮不出当女工的美丽；结婚有了孩子，又为住房奔走了十几年，没有做过女人的恬静和迷人。而今，乳腺癌又剥夺了做一个完整的女人的机会，命运不让她舒舒服服地做一回女人。可面对白发的双亲，面对未成年的女儿，面对为工作而劳累的丈夫，她不敢也不能哭。这种悲痛只有做女人的才能感受到。这太不公平。女儿们的姊妹之情是很感人的。二妹没有号啕大哭，姐姐和小妹也没有泣不成声，倒是姐姐给二妹唱了一支歌，“七个调唱走了六个半”，二妹破涕为笑。姐姐把二妹送进手术室，在冰天雪地中为二妹买了一束她从来没有接受过的鲜花，踏着积雪归来。

汪曾祺饱含深情，由衷赞美——我不知道车军是谁，似乎不是个作家，这篇文章也并没有当一个文学作品来写，只是随笔写去，然而至情流露，自然成文。

作者似乎没有考虑怎样结构，然而这种朴素自然的结构是最好的结构。

结尾也极好：“我呢，则和小妹互相依偎着，静静地，等着你醒来。”

这是真实的、美的。读了这样的散文（应该是一篇散文了），会使人悱恻之情，油然而生。

谢谢你，车军！

汪曾祺不仅自己写，还邀请好友林斤澜、邵燕祥一起写。

林斤澜《隔河看柳》——《爱是一束花》读后400字。他说：“写作的说到底，还是依靠真情实感。”如果“写起来总觉得不够东西，就添南添北。添得好了，烘托金子分外耀眼。添得不好，叫做黄土埋没真金。索性不增不删，原汤原汁，有几句算几句，只求一吐为快，往往出来感人文章”。可是，“职业写家的难处也

不少，以写为业，好比一日三餐，还要写必感人！岂可原料交易？要求展开，要求深入，要求完整，要求变化，还有职业中人也说不清的升华这样的事”。林斤澜结尾吐槽并点题——

目前刚进入市场经济，市场上“水货”不少：洒水、浸水、掺水，还有注射水云云。期刊上的白纸黑字，也嫌水分过多，看起来已经形成通病了。

忽然一篇“纯情”文字，醒了眼目。正当“隔河看柳”的日子，厌了黄纸，不期而期，一丝新绿，飘飘拂拂。

汪曾祺并非“第二天”跟邵燕祥约稿。邵燕祥“中午一进门家，就接到汪老电话”，他“急忙上街买了份报”，当天写下1100字的《不止因为真情》。他坦陈：“若不是曾祺老人提醒，这篇题为‘爱是一束花’的千字文，我多半会忽略过去。报刊上什么‘爱’‘这’‘爱’那的文字太多了，真有点嚼嚼嚼嚼的口香糖，沾到哪儿都嫌污染。”邵燕祥想起和林斤澜主编《散文与人》丛刊，刊出徐晓《爱的五月》被《天涯》转载后，他又重读这篇万字长文，掩卷之余，还是不能把这篇散文打动人原因弄清楚。可“今天遇到这篇短文，翻过来掉过去没多少字，是寻常的白描，绝没有刻意的修辞功夫，几乎一眼就可以从字面看到纸背了，是什么使人感动呢？”他自问自答——

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感动，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嚼嚼以至炫耀自己富贵的幸福或不幸福的女士，作者即姐姐向我们叙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年职业妇女，在我们习见的一些日常的不如意之外，又遭到了既来之就无法避免的病痛。牵动了我们的心的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命运。当我看到作者即姐姐竟从梁凤仪的书里得到启发（“没有收到过鲜花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而去买花的时候，一边为梁女士的小说有此歪打正着的效应不禁发笑，但又为文中的主人感到几分辛酸，终于被那姐姐孩子气的心情所感染，化为或有的慰安与鼓舞了。

我们常常说一篇抒情文章好，就在所抒之情真。这大概不错。此文就不是为“作文”而硬“作”出来的。不过，我又想，常见有些讨厌的文章，其实倒跟作者“表里如一”，并不像是“假情”，可为什么我们不敢恭维呢？这倒是值得认真琢磨一下的问题。

汪曾祺、林斤澜、邵燕祥共同为车军摇旗呐喊，这是车军之幸、副刊之幸、文学之幸。那时主政副刊《流杯亭》的编辑孙毅（笔名孙郁），像民国“副刊大王”孙伏园一样精心打理着这块园地，名家与新秀之作百花齐放。3月19日，他加“编者按”隆重推出：“……三位作家，为位名不见经传的工人作品写评论，且情真意切，编者不禁感慨万分。文坛虚情假意之作可谓多矣，车军的文章所以牵动人心，乃是用生命的光和热写出的。不矫情，不卖弄，那均是灵魂深处流出的声音。文艺是生活的写真，《爱是一束花》，便是这样动人的图景。我们希望能以此为契机，使本报副刊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同时也感谢汪老等光临《流杯亭》，一觞一咏之间，不也可看出纯真文人博大的爱意。”

我从尘封二十六年的往事中，依稀看到那达夫奖掖沈从文、沈从文提携汪曾祺的身影。汪曾祺《文集自序》说：“我知道年轻作家要想脱颖而出，引起注意，坚定写作的信心，是多么不容易。而且有那么一些人总是斜着眼睛看青年作家的作品，专门找‘问题’，挑鼻子挑眼。‘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样的胸襟他们是没有的。才华，是脆弱的。因此，我要为他们说说话。”他视“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的议论而不顾，满腔热情地为专业和业余作者写序言、写书评、生前绝笔《铁凝印象》即是他的内心独白：“我并不是那样好为人序，因为写起来很费功夫。要看作品，还要想问题。但是花一点工夫，为年轻人写序，为他们鸣锣开道，我以为是应该的，值得的。”多么古道热肠的一位老头儿，难怪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说：“老中青三代女人都喜欢你。”

# 汪曾祺「约稿」

萧跃华

2024年3月9日



2024年2月13日，下午送儿子返校